

埃及文学在中国的翻译与研究

汪 琳 曹 芮

【内容提要】埃及作为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拥有灿烂悠久的文明，其文学史发端可追溯至公元前 1700 年。从 20 世纪 50 年代开始，我国开始引进埃及的文学作品。80 年代之前的译作以短篇小说、政论文集为主，研究评论较少。80 年代后，许多重要的当代作家的作品被引进我国，译介作品百花齐放。而自马哈福兹获诺贝尔文学奖以后的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至今，翻译和研究的比重极大地偏向其作品。总体而言，中国对埃及文学的译介现已取得较为丰硕的成果，但仍存在一些问题。

【关键词】埃及文学；中国；马哈福兹；翻译

【作者简介】汪琳，浙江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南京大学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非洲文学。曹芮，浙江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本科在读（金华，321004）。

大约在公元前 3300 年，埃及人发明了象形文字，许多古埃及文学作品就是用象形文字写在莎草纸上保存下来的。从文学形式来说，埃及文学在发展进程中先出现诗歌，包括世俗诗、宗教诗、赞美诗、宗教哲理诗等，后出现散文，包括训言、箴言之类的教谕体作品及丰富的故事和旅行游记等。目前发现的最早的埃及书面文学是诞生于古埃及中王国时期的《亡灵书》，这是一部古老而宏大的诗歌总集，共二十七篇，主要内容包括歌谣、祷文、咒语和颂歌等。19 世纪初，国外学者发现了象形文字与科普特文对照的罗塞塔碑文，从而揭开了这部诗歌集的神秘面纱。早在

1957年，锡金先生就将《亡灵书》从英译本（菲兹哲罗德译）转译为了中文。可惜由于历史原因，这本书在国内图书馆已经近乎绝迹。

在历史上，阿拉伯文化对埃及的影响十分深远。阿拉伯军队曾于7世纪中叶征服埃及。从1517年开始，埃及又经历了奥斯曼土耳其帝国近300年的统治。因而埃及今天的官方宗教为伊斯兰教（95%的人口都是穆斯林），官方语言为阿拉伯语。在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统治期间，埃及文学总体处于衰落状态。直到19世纪上半叶，埃及文学的发展仍然止步不前。主流作家大多选择沿袭传统，用韵文进行创作，注重音韵骈丽和词句的雕琢，少有创新。

埃及的近现代文学始于19世纪中叶。1798—1952年，埃及曾先后被法国和英国殖民，并在两次世界大战后分别爆发国内革命。可以说，埃及近现代文学的萌芽和发展与埃及近代反殖民和民族独立的历史进程息息相关。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大批叙利亚文学家不堪压迫逃亡至埃及，也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埃及文学的现代化进程。1919年的埃及大革命激发了埃及人民的民族觉醒意识，促使埃及文学界开始重视发掘和研究文学遗产。1953年6月，埃及正式成立共和国，获得独立。此后，埃及文学的主题便由民族独立转变为国内社会革命。与此同时，埃及国内的出版印刷事业得以发展，为文学的繁荣创造了必要的物质条件。埃及文学开始了追赶西方文学的脚步。我国引进埃及文学作品始于20世纪50年代。在80年代之前，译作以短篇小说与政论文集为主，研究评论相对较少。80年代期间，我国引进许多重要的埃及当代作品，译介百花齐放。而自20世纪90年代，主要是马哈福兹获诺贝尔文学奖以来，译介和研究就在很大程度上向其作品及写作风格倾斜。本文主要分20世纪80年代之前、80年代、90年代以来三个时期，按时间线性顺序来分析埃及文学在中国的翻译与研究情况。

一 20世纪80年代之前

我国翻译、引进埃及作品的历史最早可追溯至20世纪五六十年代。1956年5月30日，埃及与中国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成为第一个与中国建交的阿拉伯国家与非洲国家，开启了中国与埃及友好合作关系的大

门。随后，锡金先生所转译的《亡灵书》也开启了中国翻译埃及文学的历史篇章。

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迈哈穆德·台木尔（1896—1973）、陶菲格·哈基姆（1898—1987）以及穆罕默德·哈尼斯·海卡尔（1923—2016）的作品是国内译介的重点，体裁以政论文集和短篇小说为主。正如林丰民在其论文《埃及现代短篇小说》开篇所述“埃及短篇小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间和五六十年代是它的两个繁荣时期，在这两个时期，短篇小说作家之多，作品水平之高，都居阿拉伯各国之首”^①。可以说，埃及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涌现的优秀短篇小说是近现代埃及文学之冠上一颗闪耀的明珠，而小说的繁荣自然带来了译作入华的第一个小高峰。

迈哈穆德·台木尔及其兄长以小说创作闻名，前者更是被誉为埃及现实主义小说艺术的奠基者、埃及短篇小说之父。197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台木尔短篇小说集》，这是我国“文化大革命”后出版的第一个阿拉伯作家，也是第一个埃及作家的文学作品。因此，迈哈穆德·台木尔对于中国的埃及文学译介有着特殊的意义。1979年，邬裕池在《上海外国语大学学报》上发表了《台木尔和他的小说——评〈台木尔短篇小说集〉》^②。这是国内最早的关于迈哈穆德·台木尔生平及作品研究的文章。之后，陈挺和李唯中也分别在1982年和1994年（作家百年诞辰）发表了关于其生平及作品的文章。邬裕池和陈挺的文章主要介绍和分析了台木尔短篇小说代表作的内容梗概与写作风格。而除了作品，李唯中还重点介绍了作家的家庭背景与人生经历，使中国读者对作家有了更全面、更立体的认识。

20世纪80年代之前是迈哈穆德·台木尔在国内译介的“爆发期”，基本为短篇小说集，如《埃及短篇小说集》（作家出版社1957年版，孙琪璋译）、《阿拉伯短篇小说集》（作家出版社1958年版，水景宪、刘文焱译）、《二路电车》（作家出版社1963年版，水景宪等译）、《台木尔短篇小说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邬裕池等译）等。根据邬裕池的统计，20世纪50年代，台木尔的作品首先由俄文等文种转译成中文，

① 林丰民 《埃及现代短篇小说》，载《阿拉伯世界》1988年第3期，第38—39页。

② 邬裕池 《台木尔和他的小说——评〈台木尔短篇小说集〉》，载《上海外国语大学学报》1979年第3期，第59—63页。

如《二路电车》、《彩票》等名篇。20世纪70年代,其作品开始由阿拉伯文直接译成中文。台木尔一生共著有四百余篇短篇小说,译成中文的不足四十篇。其中最脍炙人口的短篇小说当数《小耗子》、《沙拉姆帕夏的姨妈》(又译《沙良总督的姑妈》)、《塔瓦杜德太太》、《穆台瓦里大叔》等。《小耗子》写的是一个孤儿雇佣工受尽欺凌的悲惨境遇,首先被收入《外国短篇小说选》(上海文艺出版社1978年版),继之又被多种文学选集收入,如《外国短篇小说》(湖南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外国儿童文学作品选读》(山西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外国短篇小说赏析》(江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中外文学名作提要》(缩写收录,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古今中外文学名著拔萃》(青岛出版社1990年版)、《外国儿童文学作品选》(长春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世界文学精品大系》(春风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等。此外也曾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黑龙江人民广播电台等多家电台多次播放,且被改编成连环画载于《连环画报》《儿童时代》等画刊上。迈哈穆德·台木尔的短篇小说受中国读者的欢迎,由此可见一斑。

小说家、戏剧家陶菲格·哈基姆也是国内译介的重点。其长篇小说《灵魂归来》(1933)描写的是1919年埃及人民的武装起义,并在使用对话方面取得重大进步。他还以在司法部门的工作经历为题材,创作了小说《乡村检察官手记》(1937)。1979年,杨孝柏将《乡村检察官手记》译成中文,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次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再版时,题目被译为《乡村警察官手记》。我国学者对陶菲格·哈基姆的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以后。其中,有以李振中的《阿拉伯戏剧大师陶菲格·哈基姆》为代表的概述性研究;以伊宏的《陶菲克·哈基姆社会哲学观初探》和马学勤的《从〈洞中人〉的戏剧冲突看陶菲格·哈基姆的美学观》为代表的关于其创作思想的研究;以及以丁钰梅的《埃及作家陶菲格·哈基姆的文学创作》为代表的关于其写作风格的研究。

穆罕默德·哈尼斯·海卡尔是“著名的埃及新闻巨子,被西方新闻传播界誉为世界上最权威的记者之一”^①。20世纪70年代,国内翻译了他的三部著作:第一部是有关埃及已故总统纳赛尔的传记类作品,原作出版于1973年,中文译为《开罗文件:纳赛尔同世界领袖、叛逆者和政治

① 齐前进《埃及新闻巨子——海卡尔》,载《中国记者》1989年第3期,第59—60页。

家关系的内幕》(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上海外国语学院英语系翻译组译);第二部是记述1973年埃及第四次中东战争的著作,原作出版于1975年,中文译为《斋月战争》(商务印书馆1975年版,钟飞、辛华译),次年,上海《国际问题资料》编辑组又将该书译为《通向斋月战争之路》,再度出版;最后一部是1978年出版的《苏联人同阿拉伯人关系史话》,1979年中译本由新华出版社(星灿译)出版。这三部中文译作的特殊性在于:一方面,译著与原著出版时间极为相近,几乎是隔年甚至同年出版;另一方面,译著在20世纪70年代接连推出,是这一特殊时期极为少有的现象。其背后的原因与中埃两国的外交历史息息相关。1955年的万隆会议上,周恩来总理与当时的埃及总统纳赛尔结成终身的忘年之交。海卡尔与纳赛尔自1948年相识以来就保持着非常密切的私人关系,1952年纳赛尔出任埃及总统之后,海卡尔成为了其最具权威的代言人,多年担任其新闻顾问。1973年年初,海卡尔初次访问中国,受到周恩来总理的接见。在随后的7年里,国内之所以一口气翻译出版了作家的3部作品,是因为一方面受到了国家友好外交关系的推动,另一方面也表明了海卡尔的作品质量之高,国际视野之广。1992年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了作家的《愤怒的秋天:安瓦尔·萨达特执政始末》(关隅、马瑞瑜、周时中译),揭示了埃及总统萨达特的生平。

二 20世纪80年代

改革开放之后的20世纪80年代是外国文学翻译空前繁荣的时期。经过长期的文化封锁,中国读者对文学文化的需求已如饥似渴,对国外作品尤其好奇。在这一时期,埃及文学作品的译介百花齐放,国内引进了更多埃及当代重要作家的作品。《译林》《世界文学》等期刊上都发表了相当数量的埃及文学作品译作,不一而足。在译著和研究方面,塔哈·侯赛因(1889—1973)、尤素福·西巴伊(1917—1978)、穆罕默德·侯赛因·海卡尔(1888—1956)三位小说家在这一时期占据重要地位。

塔哈·侯赛因被誉为阿拉伯文学泰斗,其自传体小说《日子》三部曲(1929、1939、1962)中的第一部在阿拉伯文学界产生了重大影响,使人们开始对长篇小说产生兴趣。《日子》三部曲作为他的代表作,早在

1961 年就由作家出版社（秦星译）首次在中国出版。1987 年，周锡昌在其《塔哈·侯赛因与他的〈日子〉》一文中详尽地介绍了写作背景、作家生平、三部曲的主要内容、作品的表达内涵及其与所处时代的联系。周锡昌认为侯赛因的优秀著作除《日子》外，还有小说《鸬鸟的召唤》（1934）、《苦难树》（1944）、《真正的诺言》（1950）、文艺论文集《争论和批评》（1955）等。不过，只有《鸬鸟声声》（白水、志茹译）在 1984 年由盲文出版社出版。国内后来的研究更关注塔哈·侯赛因作品中体现出的哲学及社会思想，具体可参见冯怀信的《塔哈·侯赛因哲学思想初探》^①、《塔哈·侯赛因教育思想述评》^②、《简论塔哈·侯赛因的社会政治思想》^③ 等文章。此外还有一些相关的学术报道，如《阿拉伯世界》1984 年第 3 期上的《相会在尼罗河畔——埃及“第十届塔哈·侯赛因学术大会”纪实》（郭黎著）和 2002 年第 4 期上的《塔哈·侯赛因与开罗大学》（何英琴、余章荣著）等。1988 年，华夏出版社出版了黎巴嫩米尔沃等所著的塔哈·侯赛因传记《从盲童到文豪》，这是我国首次翻译外国学者关于埃及作家的研究著作。

作家尤素福·西巴伊为 20 世纪 60 年代埃及的文化复兴立下了汗马功劳。比较著名的小说有《伪善之地》（1949）、《水夫死了》（1954 年）和《回来吧，我的心》（2 卷，1954）等。作为在小说领域享有极高声誉的作家，他的作品不仅在技巧与主题方面体现出明显的发展与进步，而且在使用语言方面展现出一种极其大胆的态度。20 世纪 80 年代之后，我国引进了尤素福·西巴伊的多部作品。如 1980 年新华出版社的长篇小说《人生一瞬间》（王凤序、王贵发译），1983 年湖南人民出版社的《罪孽》（郭黎译）和上海译文出版社的中篇小说《回来吧，我的心》（朱威烈译），以及 1986 年内蒙古人民出版社的长篇小说《废墟之间》（李唯中、杨言洪译）。遗憾的是，西巴伊的短篇小说集至今尚未引入我国。相比译作的丰富，针对西巴伊的研究类文章并不多，在《为女性和爱情代

① 冯怀信 《塔哈·侯赛因哲学思想初探》，载《西亚非洲》1998 年第 3 期，第 48—52 页。

② 冯怀信 《塔哈·侯赛因教育思想述评》，载《阿拉伯世界》1997 年第 4 期，第 45—47 页。

③ 冯怀信 《简论塔哈·侯赛因的社会政治思想》，载《西亚非洲》1998 年第 6 期，第 61—64 页。

言——读尤素福·西巴伊的《我去了》》一文中，鞠舒文不仅向读者介绍了作家1950年出版的小说《我去了》的故事梗概，也简单介绍了作品中“女性”与“爱情”的两个主题与作家生平之间的关系。

穆罕默德·侯赛因·海卡尔被誉为埃及的长篇小说之父。他于1914年发表了长篇小说《泽娜布》，描写了几对青年男女由于社会地位差异无法终成眷属的悲剧故事，在当时引起了极大的社会反响。可惜《泽娜布》至今尚未有中文译本。1986年，新华出版社出版了作家1933年的作品《穆罕默德生平》（王永芳、赵桂云译）。2015年，华文出版社将此书再版。

在20世纪80年代，除了塔哈·侯赛因、尤素福·西巴伊和穆罕默德·侯赛因·海卡尔，首次被引进我国的作家和作品还有：伊赫桑的《埃及现代短篇小说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邬裕池、仲跻昆等译），阿·拉·法赫米的《为了自由》（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杨期铨译）等。

三 20世纪90年代以来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国内开始出现少量关于埃及戏剧的论文和译作。1952年大革命之后，开启了埃及戏剧史上最多产的二十年。因此，20世纪五六十年代被文学界称为“埃及戏剧的黄金时代”。有关戏剧的中文译作只有埃及文学史家海卡尔的《埃及小说和戏剧文学》（上海译文出版社1993年版，袁义芬、王文虎译）。研究埃及戏剧的论文大多集中在“黄金时代”上。在《文明古国的戏剧复兴——埃及现代戏剧述评》^①中，杨雁着重介绍了两名剧作家及其代表作：一是戏剧复兴初期“现代戏剧第一个弄潮儿”的陶菲格·哈基姆，二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启发了梦想变革的一整代人”的纽曼·阿舒尔。在《漫谈埃及早期戏剧》^②中，虞晓贞从历史流变的角度介绍了埃及戏剧从法老时期到被殖民后的题

① 杨雁 《文明古国的戏剧复兴——埃及现代戏剧述评》，载《戏剧文学》1992年第11期，第51页。

② 虞晓贞 《漫谈埃及早期戏剧》，载《阿拉伯世界》1997年第2期，第29—31页。

材及创作格式方面的变化。而在《尼罗河畔戏剧的黄金时代——埃及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戏剧》^①中，邹兰芳更多地介绍了戏剧在当时埃及所拥有的社会职能，着眼于戏剧和人民生活之间更深层的联系。

在埃及诗歌研究领域，国内出现了一批新的学者。但总体而言，埃及现代诗歌的发展虽然受到民族解放运动高涨的影响，却未进一步革新，和小说相比黯然失色，在国内的研究也较为小众。2001年张洪仪发表《埃及诗人朱维戴的诗剧创作：历史与现实》（《国外文学》2001年第1期），可能是国内第一篇研究埃及诗歌的论文。直到2009年，国内才出现了第一部研究埃及诗歌的专著：张洪仪撰写的《全球化语境下的阿拉伯诗歌——埃及诗人法鲁克·朱维戴研究》（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该书梳理了阿拉伯近代诗歌发展的轨迹，然后通过对比埃及诗人法鲁克·朱维戴的深入研究，揭示了阿拉伯诗歌在世纪交替之际出现的变化趋势，为关注这一领域的学者打开了新视角。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埃及出现了许多新的作家，其中最著名的作家就是纳吉布·马哈福兹（1911—2006）。作为世界文坛中影响力最大的阿拉伯语作家，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他创作了约50部中篇小说和短篇小说集，是公认的阿拉伯语长篇小说的巨匠和现代小说的旗手。马哈福兹的小说在思想上着重揭露社会黑暗现实，探索人生道路，追求理想境界；在艺术上既重视民族文学传统模式而有所继承，又吸收西方文学创作方法而有所创新。1988年获诺贝尔文学奖之后，国内对埃及文学的译介和研究就比重极大地偏向于马哈福兹。其长篇小说“开罗三部曲”先后有三个版本的译本，大量的访谈录、生平传记、研究论文也相继出现。马哈福兹成为了目前国内中文译作数量最多的阿拉伯语作家。

马哈福兹的作品最早被翻译成中文是从1980年的两部短篇小说开始的，分别是《一张致人死地的钞票》（范绍民译，载《阿拉伯世界》1980年第2期）和《木乃伊的觉醒》（孟早译，载《外国文学》1980年第6期）。其后不少名篇又被陆续收录在一些刊物和中短篇小说集当中：如1981年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阿拉伯文学专辑《走向深渊》中收录有元鼎译的中篇小说《卡尔纳克咖啡馆》和仲跻昆译的短篇小说《土皇帝》；

^① 邹兰芳《尼罗河畔戏剧的黄金时代——埃及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戏剧》，载《戏剧艺术》2013年第5期，第50—59页。

1983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埃及现代短篇小说选》中收录了关偶译的《调查》；同年外国文学出版社出版的《非洲当代中短篇小说选》中还收录了李桅译的《小偷与狗》。1989年，即马哈福兹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第二年，无论是长篇小说还是中短篇小说的译介都进入井喷状态，后者有《纳吉布·马哈福兹短篇小说选萃》（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葛铁鹰等译），中篇小说《米拉玛尔公寓》（仲跻昆译，载《世界文学》1989年第2期），短篇小说《暴君》（静子译，载《外国文学》1989年第2期）、《特命代表》（谢传广、时岚译，载《世界博览》1989年第2期）和《一个青年的日记片断》（陶慕华译，载《译林》1989年第3期）等。1993年，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短篇小说集《真主的世界》（解传广译）。1996年出版的《世界短篇小说精品文库·阿拉伯卷》收录了李建文译的《名声不好的家庭》和仲跻昆译的《土皇帝》。同年发表的短篇小说译文还有《旧案真凶》（杨文祥译，载《当代外国文学》1999年第2期）。21世纪也有一篇《宰阿贝拉维》（薛庆国译，载《外国文学》2008年第1期）发表。

长篇小说方面，马哈福兹创作的顶峰就是20世纪50年代出版的“开罗三部曲”。小说并没有从正面直接叙述1919—1946年的历史性大事件，而是描写了一个普通埃及家庭三代人的生活，从而反映了埃及现代历史上最重要时期的风云变幻。“开罗三部曲”的问世标志着埃及文学中现实主义小说的成熟，其影响扩展到阿拉伯半岛和北非，推动了阿拉伯现代小说的发展与繁荣。“三部曲”仅在中国国内就出现了三个中译本：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出版的三卷本《宫间街》《思宫街》《甘露街》（朱凯、李唯中、李振中译）；外国文学出版社在1990年和1991年出版的三卷本《两宫之间》《向往宫》《甘露街》（黎宗泽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出版的三卷本《两宫间》《思慕宫》《怡心园》（陈中耀、陆英英译）。

其他长篇小说按出版先后主要有：马哈福兹第一部译成中文的长篇小说《平民史诗》（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李唯中、关偶译）、《梅达格胡同》（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鄧溥浩译）、作者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最后的遗嘱》（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版，孟凯译）。1988年获诺奖后的三年里，国内集中出版了马哈福兹的多部中文译著，如《名妓与法老》（北岳文艺出版社1989年版，孟凯译）、《人生的始末》（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版，袁松月、陈翔华译）、《世代寻梦记：我们街区的孩子

们》(花城出版社1990年版,李琛译)、《续东方夜谭》(中国文联出版社1991年版,谢秩荣译)、《新开罗》(上海译文出版社1991年版,冯佐库译)、《尊敬的阁下》(文化艺术出版社1991年版,蒋和平译)、《雨中情》(文化艺术出版社1991年版,蒋和平译)、《街魂》(漓江出版社1991年版,关偶译)等。之后的译著仍然会不定期与读者见面,如《底比斯之战》(上海译文出版社1992年版,良禾译)、《“历史三部曲”《命运的嘲弄/拉杜比丝/底比斯之战》》(上海译文出版社1998年版,孟凯、袁义芬、周顺贤、良禾译,该系列于2003年再版)、传记《自传的回声》(光明日报出版社2001年版,薛庆国译)、《始与末》(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版,孟凯译)、《我们街区的孩子们》(上海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李琛译)、《岁月留痕/朱威烈译作选》(宁夏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朱威烈译)、《千夜之夜》(上海文艺出版社2016年版,李唯中译)等。

除了译作之外,还出现了一些研究马哈福兹作品的著作,如论文集《大爱无边:埃及作家纳吉布·马哈福兹研究》(宁夏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张洪仪等著)。论文集选编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的研究者、部分高校教师以及社会各界阿拉伯文学爱好者对马哈福兹的介绍、研究的成果。《马哈福兹小说语言风格研究》(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8年版,谢杨著)是北京外国语大学2006年博士文库系列丛书之一。该书以马哈福兹的中长篇小说作为主要研究对象,短篇小说集作为补充,通过对马哈福兹不同时期小说中的语言材料进行举例分析,展示出他个人语言风格形成发展的过程;确定他小说语言风格的主调和多样性特点;在风格手段与表现效果之间进行推导,研究他小说语言风格的艺术表现力度及主题意义;并将马哈福兹和其他作家的语言风格作适当比较,凸显其风格的独特性。^①《纳吉布·马哈福兹小说语言中的隐喻构建与解读》(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2013年版,吴昊著)也是关于马哈福兹创作语言的专门性研究著作。该书以概念隐喻和概念合成理论为基础,结合马哈福兹小说语言中出现的隐喻语料进行分类分析,揭示其隐喻的特点和形成该特点的原因,并分析了在解读马哈福兹小说语言隐喻的过程中读者应具备

① 谢杨 《马哈福兹小说语言风格研究》,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8年版,第4页。

的素质。^①

在正式刊物上发表的相关论文更是数量繁多。其中,在马哈福兹获诺奖之后首先发表的论文大多是对其生平和主要作品的概括性介绍,如刊登于《世界知识》1988年第22期上的《一九八八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阿拉伯小说之父——纳吉布·马哈福兹》(焦燕生)、刊登于《文化译丛》1989年第2期上的《第一位获诺贝尔文学奖的阿拉伯语作家纳吉布·马哈福兹》(罗杰·艾伦;李永彩),以及刊登于《国外社会科学》1989年第2期上的《赢得世界声誉的埃及作家纳吉布·马哈福兹》(李琛)等。有关马哈福兹的作品及生平的综述,丁淑红已在其相关文章——《中国的纳吉布·马哈福兹研究掠影》^②《诺奖得主马哈福兹在中国的接受与影响研究》^③——中做了相当完整而细致的归纳,本文在此不作赘述。

在马哈福兹的众多著作中,最吸引学者研究目光的无疑是“开罗三部曲”。许多中国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其进行研究和解读。当中比较重要的论文有朱凯的《纳吉布·马哈福兹的〈三部曲〉》(载《外国文学》1986年第4期),作者在大致概括三部曲的主要内容之后,着重分析了故事背景所处的年代(1919年革命前夕至1952年革命结束前)对埃及社会的重大意义。朱凯提出,马哈福兹用一家人的经历表现整个时代的风云变幻,这一手法充满艺术性。作家不仅擅长描绘宏大的社会图景,同时也在细节上丝丝入扣地展示了20世纪前期埃及老百姓的生活风貌。相比朱凯对三部曲中故事情节和人物分析的一笔带过,谢秋荣在其《论纳吉布·马哈福兹的〈三部曲〉》(载《外国文学研究》1990年第2期)中则对主要人物进行了详尽的解读和性格分析,如封建家长的代表艾哈迈德、地位低下的妻子艾米娜、放荡堕落的长子亚辛、进步的知识分子次子法赫米、作者的化身小儿子凯马勒等,并伴有具体情节,因此文章篇幅也相对较长。谢秋荣认为在刻画人物的过程中,马哈福兹融入了对埃及政治局势和宗教的深层思考,将自己的切身体验和疑惑反思都表现在每个人物的一言一行

① 吴昊《纳吉布·马哈福兹小说语言中的隐喻构建与解读》,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2013年版,第5页。

② 丁淑红《中国的纳吉布·马哈福兹研究掠影》,载《外国文学》2009年第2期,第71—77页。

③ 丁淑红《诺奖得主马哈福兹在中国的接受与影响研究》,载《外国文学研究》2014年第6期,第136—142页。

中。其他学者则从更小的切入点对三部曲进行了研究,分析某个具体人物背后体现出的文化内涵。李文彦翻译了马哈福兹关于三部曲所接受的访问记录《我是这样写〈三部曲〉的——埃及〈消息报〉记者柏克萨姆·拉马旦访问纳吉布·马哈福兹》(载《外国文学》1990年第4期),文章主要披露了马哈福兹本人阐述的三部曲的创作初衷和人物塑造方面的问题,作家在采访中表明自身经历和小说人物际遇之间存在种种相似之处。

除了对马哈福兹的具体文学文本的研究,还有学者从整体上研究其内容思想和创作形式。如李唯中在《纳·马哈福兹小说艺术的发展阶段》(载《国际交流学院科研论文集》(第三期)1996年12月1日)中分析了马哈福兹作品在不同时期的不同类型,大致归纳成以下阶段:选择阶段、历史小说阶段、现实主义阶段和象征现实主义阶段。马哈福兹曾宣称其作品拥有三个轴:政治、信念和人。在《论马哈福兹作品的三个轴》(载《外国文学研究》1995年第2期)中,梦禾便从这一概念入手,结合作品进行探讨,并分析马哈福兹为何要在作品中凸显这三个轴。也有学者选择对马哈福兹创作风格的变化进行研究。李琛在《论纳·马哈福兹小说形式的演变》(载《国外文学》1988年第4期)中,通过对具体作品的分析,概括了马哈福兹小说形式的演变,并总结出以下规律:从简单到复杂的传统故事形式,从平面到立体、简单到开放的新形式和探索小说的民族形式。李琛的分析涵盖了马哈福兹各个时期的不同作品,从多维度对其写作手法的变化进行总结,较为全面、详尽。

还有部分学者从比较文学的角度出发,寻找马哈福兹的作品和中国近现代文学的互联性和相似之处。如尤·萨·哈塔伊白(约旦)的《鲁迅与马哈福兹文化思想的比较研究》(载《阿拉伯世界》2002年第14期)、余嘉的《前后喻文化视域中的马哈福兹与巴金的家族小说之比较》(《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S2期)、薛庆国的《“家”中的青年与文化烙印——“激流三部曲”与“宫间街三部曲”男性青年形象之对比》(载《当代阿拉伯研究》(第2辑)2006年9月20日)等。

在埃及作家的翻译与研究过程中,我国学者对马哈福兹显示出如此的偏爱主要有以下几点原因:一是其在1988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是第一位获此殊荣的阿拉伯语作家,他的作品受到国际最高级别的赞誉,对于整个阿拉伯文学世界都是意义非凡的;二是马哈福兹在阿拉伯文学世界中占

据泰斗地位，他不仅是阿拉伯世界最著名的长篇小说作家，而且在短篇小说和戏剧领域也颇有建树；三是马哈福兹作品中体现出的社会主义和民族斗争进步思想和我国新中国成立后弘扬的时代精神同符合契；四是其作品在人物刻画和思想内涵上，和中国近现代著名作家的作品体现出极大的相似性。

在埃及的女作家方面，纳娃勒·赛阿达维（生于1931年）是最具国际声誉的一位。在埃及乃至整个阿拉伯世界，赛阿达维是一位家喻户晓的传奇才女，集作家、女权主义者、社会活动家、医学博士等身份于一身。她的作品所涉猎的题材非常广泛，有关于妇女健康和卫生的科普性书籍，有自传体小说，还写了很多报告文学和新闻专题，但多数还是描述阿拉伯妇女在传统父权制社会与西方新老殖民主义多重压迫下的生活经历，尤其关注她所生活的社会中盛行的女性割礼习俗。其代表作品包括《女医生回忆录》《女人与性》《在零点的女人》《夏娃隐藏的面孔——阿拉伯世界的女性》等。迄今为止，赛阿达维已经出版30部著作，一些作品被译成30多种语言。在埃及作家中，其作品数量、种类之多仅次于马哈福兹。

然而纳娃勒·赛阿达维迄今尚未有作品被翻译成中文正式出版，反而是相关研究在21世纪第二个十年里涌现出不少成果。牛子牧作为国内研究赛阿达维的首批学者之一，以博士论文《纳娃勒·赛阿达维作品与思想研究》为基础，从2011年开始，在《外国文学动态》《译林》《世界文学》等杂志上先后发表了多篇与赛阿达维相关的论文，如《反抗与创作中的爱与乡愁——评埃及女作家纳娃勒·赛阿达维的两卷自传》《“我无畏末世火狱”——赛阿达维对“伪形化”的闪族一神教之批判》《笔与手术刀——记埃及医生、作家纳娃勒·赛阿达维》等。在这些研究论文中，牛子牧探讨了赛阿达维作品中体现出的女性主义思想和作家对宗教陋习的抨击。除此之外，牛子牧还在2014年第4期的《世界文学》上集中发表了赛阿达维的小说译作《她才应该是弱者》《周而复始的歌》《天堂里没有她的位置》和信件《致中国读者》。其他研究性论文还有评介作家创作中的女性意识的《衣带渐宽终不悔——评纳娃勒·赛阿达维的创作》（宗笑飞），以及从“三位一体”的叙述主体、自我阉割的生存迷宫、叙事夹缝中的艺术手法三个方面来探讨文本意义的《无法告别的末路骊歌——评纳娃勒·赛阿达维〈周而复始的歌〉》（孙晓娅、王琦）等。

四 问题与展望

综上所述，埃及文学在中国的译介经历了将近七十年发展，从最初的译作类型单一、研究评述匮乏到现在的百花齐放，与20世纪五六十年代相比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然而，我们也看到了一些存在的问题。

一是翻译的整体性问题。埃及文学在中国的传播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译本的数量与质量。虽然在埃及文学的译介过程中的确出现了许多著名译家，如译作数量较多的邬裕池、仲跻昆、李唯中、关雋、孟凯等学者，但不得不承认的是：不同作家的译著存在数量上的极大差异。相比诺奖得主马哈福兹的三部曲有三个译本，历史三部曲同一个译者的译本两次再版，一些埃及文学界重要作家的作品或某些作家的代表作却压根没有引入我国。诗人萨拉赫·阿卜杜·阿里·萨布尔、作家奥贝得兄弟及伊哈桑·阿卜杜·古杜斯等都在国内译界名声不显。埃及长篇小说之父穆罕默德·侯赛因·海卡尔的代表作《泽娜布》尚无中文译本。陶菲格·哈基姆除了小说作品，在戏剧领域也有出色的成就。他把哲理剧引入了阿拉伯文学，《洞中人》《山鲁佐德》都是非常优秀的戏剧作品，不过都尚未引进我国。尤素福·西巴伊的短篇小说同样如此。女作家赛阿达维是诺奖的热门人选，但其作品没有任何中文译本。对于埃及诗歌作品的翻译也有极大的挖掘空间。译作的缺失同样导致研究性论文、专著空白。今后可以以高校、出版社、学术会议等为单位，整合、丰富埃及文学的译介，打造更广泛的阅读平台，从而为发展埃及文学的研究打下基础。

二是学术研究力量的分散化问题。开设阿拉伯语的老牌高校为埃及文学的翻译与研究输送了不少人才。大多数学者都是高校老师，翻译、研究与教学并举。这本是好事，但多数学者同时还研究其他阿拉伯国家的文学，如黎巴嫩和叙利亚文学，因而在研究过程中很容易把埃及文学放到整个“阿拉伯文学”的语境下，缺乏相对的埃及文学研究集中性，也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其“非洲文学”的背景。但是值得欣喜的是，我们已经看到国内有学者以博士论文为中心，将研究集中到埃及单个作家的身上，并将翻译作为研究的先导，深入个体研究。我们希望今后能出现更多的翻译家和研究学者，将埃及文学做细做深做精。

总结而言,埃及文学作为阿拉伯文学与非洲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半个多世纪的译介努力之后,还留给后来的学者极大的研究空间。文学团体、译者、研究者、出版企业需要摆脱对西方文学及其文学奖项的迷信,高屋建瓴、把握全局的同时积极创新、踏实研究、加强交流、避免低水平重复,才能真正做好埃及文学的翻译与研究。

参考文献:

1. 陈挺 《台木尔和他的短篇小说》,载《扬州师院学报》1982年第2期,第109—113页。
2. 丁钰梅 《埃及作家陶菲格·哈基姆的文学创作》,载《中国穆斯林》2015年第4期,第71—73页。
3. 何乃英 《阿拉伯文学作品在中国的翻译出版》,载《中国出版》1992年第7期,第62页。
4. [美] 克莱因主编 《20世纪非洲文学》,李永彩译,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第316—323页。
5. 李唯中 《短篇巨匠与其长篇力作——纪念台木尔诞辰100周年》,载《阿拉伯世界》1994年第4期,第140—144页。
6. 李振中 《阿拉伯戏剧大师陶菲格哈·基姆》,载《阿拉伯世界》1985年第3期,第113—117页。
7. 林丰民 《埃及现代短篇小说》,载《阿拉伯世界》1988年第3期,第38—39页。
8. 马学勤 《从〈洞中人〉的戏剧冲突看陶菲格·哈基姆的美学观》,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2008年。
9. S. 萨默赫 《尤素福·伊德里斯短篇小说中的语言与主题》,载《阿拉伯文学学刊》1975年第6期,第89—100页。
10. 伊宏 《陶菲克·哈基姆社会哲学观初探》,载《阿拉伯世界》1988年第4期,第46—50页。
11. 周锡昌 《塔哈·侯赛因与他的〈日子〉》,载《南充师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7年第1期,第96—102页。

(责任编辑:王珩)

The Translation and Study of Egyptian literature in China

WANG Lin , CAO Rui

Abstract: As one of the four ancient civilizations , Egypt boasts long history and prosperous civilization. Egyptian literature can trace its origin back to 1700BC. Egyptian literature started to be introduced into China since last 50' s. The translations mainly consist of short novels and political essays , lacking literary studies and reviews. After 1980' s , works of many important temporary writers were introduced into China , the category of translations has been widened greatly. And after Naguib Mahfouz won Nobel Prize in Literature in 1988 , the focus of Chinese researchers has shifted to his works. In general , the translation and introduction of Egyptian literature has yield fruitful results while some problems still remain.

Keywords: Egyptian literature; China; Naguib Mahfouz; Translation; Study